

壹、英國的幸福工業

「幸福」是一個相當吸引人的主題，讓人忍不住想要多了解它。這多半與底下這個事實脫離不了關係：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幸福是我們（終生）所追尋的。早在古希臘時代，Aristotle就認為幸福賦予我們生命中各式各樣活動以意義與次序。「幸福」近來在學術界與公共政策領域，皆有很高的曝光率。有人甚至創造「幸福工業」（happiness industry）一詞，用來描繪在治療性文化（therapeutic culture）¹與自助論述（self-help discourse）盛行的時代中，許多熱門暢銷書與火紅課程，²都旨在教導人們「如何變得幸福／快樂」（how to be happy），它們往往運用來自於諸如正向心理學（positive psychology）或佛教的知識（Ahmed, 2007）。人們可以強烈感受到「感覺良好的工業（feel-good industry）正在豐盛發展中」（Ahmed, 2007）。

就公共政策而言，最知名的例子當屬不丹政府莫屬。1972年，不丹國王Jigme Singye Wangchuck（在位期間1972-2006年）提倡以國民幸福總值／指數（Gross National Happiness, GNH）作為評量人民生活品質，以及檢視國家施政良窳的指標。隨後，許多國家相繼以幸福（happiness）或福祉（well-being）作為目標，並視之為可測量的項目，從而衍生真實發展指標（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, GPI）（Ahmed, 2007）。同樣地，英國保守黨領導人Cameron（2010）

¹ 治療性文化是一個社會學的說法，指涉的是「出現一種心理學上的心態，一種治療性的思考與說話方式，這在傳統心理學空間，譬如治療室、診所與學術科系之外，變得是顯然可見的」（Madsen, 2014）。

² 單單在2006年，就有許多書籍以幸福的科學與經濟學之名問世，請參見Ahmed（2007, p. 13）一文註腳3。早先一年，Layard（2005）就出版熱門暢銷書《快樂經濟學》（*Happiness: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*），該書中文版譯者陳佳伶將書名譯為《快樂經濟學》（2006）。推測主要緣由是因為Layard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著名的經濟學家，書中有許多經濟學實徵性研究資料作為立論依據。但其實當中引述的證據來源，除了經濟學外，尚有大量心理學（包含正向心理學）、腦神經科學研究成果等，即廣義的「幸福科學」。

也談論幸福作為政府施政的依據，在其首相任內，他旨在「讓幸福成為新的GDP」。

影響所及，英國教育政策也發生一個有趣的轉向，從1990年代盛行的「標準議程」（a standards agenda）轉向2000年代的「提升議程」（the enhancement agenda），後者聚焦在「所謂的非認知特質，像是信心、動機、復原力、福祉與自尊」。這是關於如何讓孩童「感覺更好——更有動機、更有信心、更快樂」³（Cigman, 2008, p. 540）。Ahmed稱呼它為「幸福轉向」（Ahmed, 2007, p. 8）。概念的流行固然來來去去（Cigman, 2008），但重要的是，我們需要思考何以幸福之說會於現在湧現？類似說法也為K. Kristjánsson所呼應。他表示，當前的時代精神反映的是對「豐盛兒童」⁴（flourishing child）⁵的興趣（Kristjánsson, 2015a），現代西方教育典範圍繞在兒童的豐盛、幸福與實現（fulfillment）等⁶主題上。

對英國幸福轉向的一個合理解釋，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（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's Emergency Fund, UNICEF）在2007年出版的有關兒童福祉的國際報告有關，該報告名為《透視兒童貧窮：富裕國家兒童福祉的概觀》（*Child Poverty in Perspective: An Overview of Child Well-Being in Rich Countries*），在英國受到前所未見的公眾關注，因為英國兒童與年輕人在情緒福祉（emotional well-being）與幸福方面，在接受調查的21個工業化國家排名中敬陪末座（Morrow & Mayall, 2009）。

³ 〈學習的社會與情緒層面〉（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, SEAL）這份政策文件是這方面的一個事例。SEAL的部分內容旨在教導學生學會「我知道什麼東西讓我感覺良好，也知道如何提升這些舒服的感受」（Cigman, 2008, p. 540）。

⁴ 追究造成當前典範的智識根源，至少包含德行倫理學的興起、正向心理學運動的推展、對主觀幸福論的幻滅，改而尋求較客觀的幸福尺度等（Kristjánsson, 2015a）。

⁵ 本文將flourishing翻譯為豐盛的，此譯法亦可參見於黃慧英（2012，頁217）。

⁶ 本文暫且將這些概念視為可以彼此代換的同義詞，另與Aristotle《尼各馬科倫理學》（*Nicomachean Ethics*）談論的主題eudaimonia（英文常譯為happiness或flourishing，中譯為幸福）有關。